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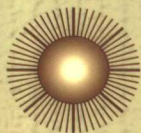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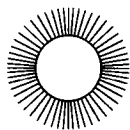
of "10 · 5"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11 · 5"

of Natio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下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

Research
of "10 · 5"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11 · 5"
of Natio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下 卷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
“十一五”发展趋势（上、下卷）

编 者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武与礼 乐同淦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81

字 数 / 1320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230 - 049 - 5/D ·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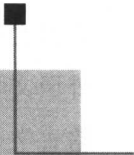
定 价 / 198.00 元（上、下卷共两册）（含光盘）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 卷 (1 ~ 658)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3
党史·党建	77
哲学	269
理论经济学	355
应用经济学	427
政治学	479
社会学	509
法学	551
国际问题研究	621

下 卷 (659 ~ 1284)

中国历史	661
世界历史	699
考古学	753
民族问题研究	773
宗教学	813

中国文学	859
外国文学	887
语言学	943
新闻学与传播学	1025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079
人口学	1131
统计学	1187
体育学	1227
后记	1284

下 卷

中国历史 \ 661 ●

世界历史 \ 699 ●

考古学 \ 753 ●

民族问题研究 \ 773 ●

宗教学 \ 813 ●

中国文学 \ 859 ●

外国文学 \ 887 ●

语言学 \ 943 ●

新闻学与传播学 \ 1025 ●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 1079 ●

人口学 \ 1131 ●

统计学 \ 1187 ●

体育学 \ 1227 ●

后记 \ 1284 ●

“十五”时期是 21 世纪的最初 5 年。作为新世纪的起点，在党中央“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针的指引下，广大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家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制定之际，全面回顾“十五”期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总体状况，认真总结本学科学术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得失，对于未来 5 年的中国历史研究的顺利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以下对近 5 年来中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分几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 “十五”期间中国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一）中国史研究外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首先，中国史研究的外部环境 5 年来越来越得到改善，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期。这首先表现为国家对史学研究予以高度的重视，中央专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成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史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与价值受到充分的肯定，其在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投入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无论是教育部系统的“211”工程、“985”工程，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市社科研究机构设立的科研项目，中国史研究都在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和较大的比重。从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的《中华大典》、北京大学盛唐工程和明清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与“乾嘉学派研究”等项目，到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国古籍善本再造工程，一个接一个的重点学术建设项目应运而生，使得中国史研究的资源得到了很好的整合，中国史研究的开展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其次，表现为中国史研究的阵地不断拓展，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独特的历史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史研究 5 年来的长足进步，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社会各界对它的重要性形成普遍的共识，刊发相关研究成果的刊物的增多就从一个侧面显现了这一趋势。除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之外，许多新生的刊物，如《国学研究》、《华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唐研究》、《明清论丛》、《中国学术评

论》、《中国学术》等等，均以中国史研究为其主要对象，从而推出了一大批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各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长期的学术传承过程中所形成的各自学术特色更加趋于显著，分别形成了相对突出的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和政治制度史研究，南开大学的社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先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南京大学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学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等等，都成为国内中国史研究某一领域的学术重镇，既分兵合击，又整体发展，推动中国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之间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学术合作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大门的进一步打开而有了新的进展，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田浩教授参与北京大学“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课题的具体研究；中、澳、美等国联合从事河南伊洛流域考古调查，中、日、蒙多国就内蒙古等地草原文化考古展开合作等等，就是这种学术合作的一个缩影。另外像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田浩的《朱熹的思维世界》等著作在祖国的出版，彭慕兰与黄宗智就18世纪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论争引入境内，也都已经在中国史研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中国史研究外部环境不断获得改善的具体例证。

其三，表现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大众传媒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关注日益加强。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自2002年初开办至2003年底，已举办了28期，听讲的部级领导干部超过2000多人次。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陕西电视台的“开坛”，都有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讲座节目；安阳电视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历史所联合摄制的“百年甲骨”系列文献纪录片，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摄制的“古今战场巡礼”专题片等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众多历史题材影视剧，如《雍正王朝》、《康熙大帝》、《成吉思汗》、《汉武帝》等的播映，更激发了社会大众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关注。而研究机构与个人利用网络资源，通过中华文史网、国学网等反映与传播中国史研究成果，也有力地改善了整个研究的外部环境。一些读者面甚广的报刊如《光明日报》、《读书》、《文汇报》、《博览群书》等，在近几年重视发表历史学家的学术随笔，在一定程度上嫁接起了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桥梁。尽管大众文化消费与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但大众文化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关注，仍不失为中

国历史研究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①。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雷达最近撰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总结历史观的大变革^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众文化对历史关注的一个象征。

（二）中国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十五”期间中国史研究在各个领域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与“八五”、“九五”在中国通史编撰方面成就卓著的情况有所差异的是，“十五”期间的中国史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反映为各类大型专门史的通史编撰受到广泛的重视，佳作迭出，蔚为大观。它们既包括传统学科分类的著作，如《中国政治通史》、《中国经济通史》、《中国法制通史》、《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等，也包括按问题性质分类的著作，如《中国风俗通史》、《中国礼制通史》、《中国运河文化史》、《中国长江文化史》、《中国人口史》、《中国饮食史》等，还包括以地域或区域为研究对象的通史著作，如《齐鲁文化通史》、《湖北通史》、《浙江通史》等。它们与一般的通史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编写和出版从一个专题或问题的层面与方向，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总体面貌的认识。

在关注和从事通史型著作编撰的同时，史学工作者更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开展具体专题的研究，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质量、观点自成一说、史论结合较好、研究方法新颖的专著，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逐年出版的“东方历史学文库”系列专著，三联书店逐年出版的“燕京·哈佛学术丛书”中的系列历史论著，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的老一辈史学家的论著专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齐鲁书社、岳麓书社、三秦出版社等专业古籍出版社策划组织的相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专门著述。这些著作较之于通史型著作往往具有专门化、精深化的特点，体现了所在专题范围内的前沿水平，因此在同行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对学科建设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是中国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背景之一。2000~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历史研究项目（含自筹经费项目）总共有266项，包括一些此前立项而在这一期间完成并出版的课

① 参见刘后滨《中国古代史学科进展》，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 2004——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② 参见雷达《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2003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

题，成果蔚为大观。其中不少成果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进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为下一步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在整个中国史研究中起到了某种指导作用。如文献整理方面，武汉大学朱雷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吐鲁番文书总目〉中国藏卷、日本藏卷、欧美诸国藏卷》，汇集海内外所藏吐鲁番文书进行统一编目，介绍了相关文书的形状、内容及有关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吐鲁番文书提供很大的方便。中山大学王承文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敦煌古灵宝经文书与晋唐道教》，结合出土文献、碑刻资料与传世文献，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古灵宝经》，展示了晋唐道教整合与中古道教统一的经教体系确立的具体过程，进一步推动了敦煌学、道教文献、道教史的研究。在思想史方面，曲阜师范大学傅永聚主持的“20 世纪中国儒学研究”，其最终成果是 21 卷本《20 世纪儒学研究大系》系列丛书（中华书局，2003 年 12 月）。这套丛书集文献编纂、专题研究与总体反思于一体，全面总结和评述了百年来中国儒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是一部中国现代儒学研究的世纪年鉴，为新世纪儒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山东大学郑杰文主持完成的项目成果《中国墨学史》，对墨子、墨家学派从产生、形成到发展、流变的过程进行了梳理，是一部系统研究墨学发展史的专著，对墨学史研究和学术史研究将起到积极作用。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武汉大学陈锋主持的项目成果《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对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进行了扎实的实证研究。在立项项目中，这方面的课题相对较多，有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项目，也有关于灾荒、人口、生态与环境变迁、西部开发、乡村社会、商业、金融、海外贸易等方面的专题研究项目，表明史学界对国计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主持的重点项目成果《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分析了各种史学思潮、史学成果、史学事件，揭示了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特征，预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向及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立项项目中相关的课题还有陈其泰主持的《唯物史观与 20 世纪中国史学》（2001），瞿林东主持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研究》（2004），张海鹏主持的《20 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走向》（2001）等，都是从宏观角度总结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重大项目。

中国史研究方面学术论文数量稳步递增，论文质量有所提高，也是“十五”期间中国史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以隋唐五代史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00～2003 年度，每年有关研究性论文都在 400～500 篇之间。所

讨论的问题包括该时期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地方政权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礼仪与礼制、法律制度、财政与土地制度、工商农业、区域经济、军事制度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民族与中外关系、边疆史地、思想文化、士人群体、风俗习惯、妇女生活、婚姻家庭、学校教育、宗教文化、历史人物、墓志碑铭、吐鲁番文书、敦煌学等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不少论文在学术上都有自己的创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整体进步。其他断代史、近现代史、专门史、史学史、历史地理的研究情况与隋唐五代史研究有类似之处，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稳步发展的积极气象。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随着人们问题意识的强化、现实关注点的聚焦、学术前瞻视野的拓宽而显著得到加强。如“大一统”观念的弘扬与中华民族一体多元共识的广泛深入，促进了辽金西夏史研究的日益繁荣。西部大开发的热潮澎湃，驱动西北史地研究的不断进取。中华文化主体意识的凸现与对外文化交流的形势，直接鼓舞和推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评估与扬弃借鉴。

此外，高等院校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在“十五”期间也有新的进展。如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系列教材，清华大学编写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专题讲座》等专门史教材，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教材等等，都以其独到的见解、合理的体裁、丰富的内容而受到人们的欢迎，为历史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条件。这方面成就的取得既植根于中国史研究整体进步的深厚土壤，同时又转而对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十五”期间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就探讨的范围看，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史学进行了较为深刻和全面的反思与总结，除前列一些相关重点项目和重要成果外，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的历史卷，也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些重大争论进行了描述和综合。另一方面是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层发掘与阐释，包括对唯物史观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的反思，以及对西方新史学中“后现代史学”的批判借鉴。同时，我国史学界还在如何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问题上展开了争鸣。这一学术现象，反映了我国史学界对史学理论构建的关注，体现了我国历史学研究的新发展。其中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①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结，比较清晰地梳理了从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再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三次大转变的脉络与进程，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史

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中国史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经世致用”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总结了一度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庸俗化的沉痛教训。②对唯物史观对我国史学发展的理论指导意义做了进一步的肯定，进而阐发了其科学的思想内涵与方法，并就如何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进行了学术争鸣，大大延伸与拓展了理论探讨的空间。③对五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源流与科学性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和论证，进而对中国社会形态做了多视角的探讨，推动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对“五种形态”说存在着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思维。通过对五种形态理论的深入讨论与争辩，史学界开始对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与发展进程进行多视角的分析和研究。尽管这一讨论在抽象的理论层次、概念的规范性上尚不成熟，但可以相信，随着独立思考的拓展与实证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必将在这一领域取得重要进展。④对西方新史学特别是“后现代史学”做了不少介绍与辨析，提出了批判借鉴西方史学的主张。这反映了我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挑战的关注与批判地吸收西方史学成果的要求，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基本特色与重点、热点

“十五”时期的中国史研究具有显著的特色。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以新文献的出土和刊布为契机，新问题不断呈现，研究空间得以拓展。随着学术积累的加强和对历史认识的深入，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呈现，传统课题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并在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有了新进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总体状况略有不同。从横的方面看，传统史学的主流政治史、经济史相对受到冷落，后起的思想史、社会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社会史堪称一时风尚。从纵的方面讲，近现代史研究的重心在向下移，或者说，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民国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从研究方法上看，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诸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学术研究内部规律在发挥作用，同时也与外部影响密不可分。

概括而言，“十五”时期的中国史研究的特色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新的文献资料的发布与利用，直接推动中国史研究的深入

资料始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地下文献的发现，对于记载简略、

文献贫乏的先秦两汉史而言，更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故王国维曾说过，自古以来任何一种新学问之始起，大都由于史料上的新发现。应该说，这些年来中国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了较大的进展，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发现了一批史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湖北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江苏尹湾汉简、湖南湘西龙山里耶秦简、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等。这中间有些简帛的内容公布是在“十五”之前，如张家山汉简、郭店楚简等，但是以此为基础从事深入的研究，并推出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的则是在“十五”期间，如有关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法律制度的研究，张家山汉简“盖庐”与兵阴阳家的研究，郭店楚简所反映儒道关系研究，走马楼吴简与三国社会经济研究等等。有些简牍的内容公布与研究工作开展则均在“十五”期间，如2001年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2002年度在湖南龙山里耶镇战国古城出土3万余枚秦简。它们对于中国先秦史研究的深入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像里耶秦简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填补《史记》、《汉书》中有关秦史记载上的某些空白，深化人们对秦代地方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诸多问题的认识。又如上博简所涉及先秦古籍近百篇，从已公布的《缁衣》、《性情论》、《诗论》等篇的内容来看，它不仅可以用来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对校，而且对先秦两汉学术发展源流与演变、儒家思想的基本命题的认识，也大有裨益。以至有学者认为，先秦两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正在迈入所谓的“简帛时代”，故而提倡“重建中国古典学”、“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① 这样的评价似乎可以商榷，但是新出土文献资料对于弥补传统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印证传世文献的真伪，深化先秦两汉历史（尤其是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则殆无疑义。

在中国古代其他断代史研究中，新资料的发现和利用也有新的进展。如有学者通过对宁波天一阁所藏《天圣令》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深化有关唐代法制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又如有学者借助于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明人手札的研究，就明代社会生活提出自己的见解。再如有学者根据大量的碑刻史料，对清代北京旗人香会进行考察，揭示了清代普通旗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并有助于理解清代民间的满汉关系。所有这些都说明，自觉运用新史料诠释中国历史是“十五”期间中国史研究方面值得充分关注的特色之一。

^① 参见江林昌《国学研究步入简帛时代》，2002年3月28日《中国教育报》。

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学者们也十分重视对新公布档案和海外资料等新文献的运用。通过对新材料的挖掘和使用，进一步推动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还原历史原貌，这些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茅海建根据中国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并参照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对原有戊戌政变的研究各说进行相应的证补和修正^①。有学者依据大量档案，专门对晚清的学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在民国史研究中，学者们十分重视对台湾地区公开档案资料的运用，使研究更为细化。曾业英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从军事学角度探讨了蒋介石在1929年讨桂战争中所运用的军事谋略^②。杨奎松利用最新公布的苏联档案，分析了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以及合作的动因^③。他还通过对祖国大陆和国民党相关档案，以及台湾大溪档案和回忆录等的综合分析，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和结果进行了梳理，从国共两党的关系、苏联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更加深入全面^④。王正华利用台北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配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探讨了国民革命军与1926年7月展开第一期北伐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⑤。另外，魏宏运等撰写的关于中国现代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论著，在史料的搜集和运用方面也做了新的尝试。

2. 新领域的开拓使中国史研究进入更全面、更完善的发展阶段

“十五”期间中国史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色，是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又有新的研究领域开拓，新话语与新命题的推衍。领域的拓展、命题的创立是人文学科发展的生长点之一。中国史研究也不例外，应当从时代语境中不断提炼新话题去反观、理解和诠释中国历史，从而保持史学研究的强大活力。

中国史研究新领域的拓展，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新研究领域的开辟，二是传统研究领域内部新的研究方向的启动，三是相对较新研究领域（如社会史、环境史、生态史）的不断加强。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互为弥补，共同促进，使中国史研究新领域拓展的努力得以收到积极的效果，

①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识、补正、修正》，《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5、6期。

② 《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③ 《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④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⑤ 《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就全新研究领域的开辟而言,“十五”期间曾有具体的表现。如军事史的研究开始摆脱局限于兵制、战争、军事思想史的窠臼,而真正回归到军事与历史相结合,突出军事战略战术层次观照的合理途径,即以武器装备演变带动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最终影响作战方式、战法理论改革的逻辑程序来认识军事史的主体面貌与发展脉络。《中国军事学术发展史》作为“十五”重大课题的立项,《中国古典战略研究丛书》、《中国战术史》等军事史著作的陆续推出,正是军事史研究以全新面貌登场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五”时期的军事史研究主流,已不再是原来军事史的延续,而应该是作为中国史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了。它不再是政治史的一个附庸,而已成为军事学科与历史学科相结合的新的边缘交叉学科。又如历史人类学、影视史学、口述史学等等,他们有的在海外早已成为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国内却属于新的领域。“十五”期间,这些学科也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史研究的大舞台。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历史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确立:2001年6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学挂牌成立并召开学术会议,当年10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南中出现了“从历史人类学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研究”一项,这标志着历史人类学的概念已经进入到现行的学术体制之内^①。

就传统研究领域内部新的研究方向启动而言,“十五”期间也有长足的进步。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史学史、历史地理学等均是传统的研究领域,然而,就在它们的内部,随着人们研究视野的拓宽与新方法的引入,又逐渐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如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典章制度研究一脉相承,但在近年来却呈现出新的转型。吴宗国主编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作为北京大学“985”工程重大成果“盛唐研究丛书”之一种,就被认为是传统课题的新突破,将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视野扩展到日常政务的运行与政治体制的演进等方面^②。又如在历史地理学内部,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已有20年,并出版了多部专著,可是,在学科理论、范围、性质、手段的界定上却未臻成熟。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得到改变。随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初探》、《环境与技术

① 参见赵世瑜《平淡是福——2001年中国史学一瞥》,2002年1月20日《中华读书报》。

② 参见吴丽娱《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等论著的面世,“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已趋于完善和成熟”,真正成为了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①。再如史学史研究也是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传统领域,但近几年来也有新的研究重点出现。像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关于历史民间史学的考察,都是以往史学史研究中被忽略的方向。而有关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过程,民间史学活动,历史知识在民间的传播,以及一系列中外史学家比较研究的论著的发表,表明民间史学、中外史学比较的研究正成为史学史研究中新的关注点,史学史的研究领域处于日益拓展之中。

就相对较新研究领域的继续开拓而言,“十五”期间更是成绩显著,形势喜人。社会史、生态史、区域史、城市史都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然而一直保持着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十五”期间,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积极从事这些新兴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日益扩充,研究对象日益具体,研究手段日益多样,研究范式日益创新。如社会史研究中对底层社会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不断细化与深入,在婚姻史、妇女史、性别史、服饰史、风俗史、饮食史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一批饶有新意的专著和论文,使人们能够对历史上民间日常生活有了更为全面生动的了解。又如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及其影响,积极从事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各个行业的环境生态史研究,从气候、水文、地形地貌、土壤、植被、城市建设与规划、人口、灾害、城市公共环境、资源开发与利用等多个方面,认真探讨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变化以及对人类生活的多种影响,为人们在今天从事经济建设过程中认真对待环境生态保护提供历史的启示。其他像区域史、城市史的研究领域同样不断有所拓展,区域文化、区域产业、区域性民间结社与宗教活动、区域自治管理、城市公共管理、城市文化建设等等,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纵观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有关社会史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多,领域十分广泛,从事研究的人数之多是其他专题史研究无法比拟的。此外,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研究中也大量借鉴社会史研究方法,使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其中最为可观的是有关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风俗与社会运动研究、关于人口和移民的研究、关于灾荒史与救灾的研究。

^① 参见曹树基《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2000年3期。

有关市民社会的研究，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市政、公共空间、近代城市等问题，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课题中，相关课题显得非常突出。2000 年有“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1840～1949）”、“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2001 年有“博览会与近代中国”、“近代中西方城市国际化模式比较研究”，2002 年有“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1840～1949）”、“国家与社会：20 世纪中国城市管理控制机制研究”、“异质文化交织下的都市生活——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研究”，2003 年有“近代瘟疫、经济转型与文化变迁——上海、东北半殖民口岸都市的鼠疫、霍乱和花柳病”、“中国早期城市化的探索：18～19 世纪的北京外来人口”。1999 年初，辽宁大学的部分专家围绕“市民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这一主题，从“城市与中国近代市民文化的生成”、“市民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的互动”、“近代市民文化的当代价值”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初步研究。此后，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加强。如有关上海市政的研究，涉及上海市政的近代化及城市的外观和空间格局，城市在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有关社会风俗与社会运动的研究，清末的“不缠足运动”在近几年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涉及到官方的反缠足努力、有关小脚的审美观念的变化等。其他如女子服饰的变化、晚清整体社会风尚的变化、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等，都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有关人口和移民的研究，则涉及民国时期人口普查、特定时期一些地方的人口迁移情况、农村的人口分布及结构等。关于灾荒史与救灾的研究，注重与政府和民间的救灾研究相结合，涉及灾害与社会以及战争、瘟疫与人口和社会变动的关系等问题。总体来说，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特点，主要是视野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地关注一般民众的生活状况。

与传统领域的研究相比，新研究领域更为注重新方法的借鉴和应用，更为注重引入多学科知识、理论与方法开展综合性研究。如在灾害史研究中，充分利用了现代天文物理、气候、地理、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又如在文化遗址学研究中，中国和希腊开始合作研究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考古遗址勘探、测图、数据管理及空间分析方面的应用^①。近现代政治史研究的拓展，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出现新的突破。

^① 参见高立兵等《中国希腊 3s 技术考古应用的合作研究》，2000 年 5 月 24 日《文物报》。